

政治

中國，演變的前景和對話

António Quinteiro Nobre *

過去，中國人慣稱自己的國家為“處於中心的帝國”，一切的事物就好像她的皇權一樣圍繞這個中心而發展。

今天似乎有一種歷史趨勢，要我們慣於向中國靠攏，因為此際尤其在亞洲普遍感到中國經過幾百年的積弱已重新茁壯起來。

今日，我們每一個人都意識到中國的重要性。很早之時，這個國家便已為我們帶來了指南針、火葯、製瓷術、絲綢、紙張和茶（茶的英文稱謂據說是從運載茶的“T”型盒而來的）。

亞洲和處於其中心的中國的經濟增長、與西方殊異但行之有效的增長意念和模式的發展、中國本身的龐大市場，在在都令我們對地球的這一角“刮目相看”和在這裏尋求合作經營。這情況在最近召開的亞歐會議（ASEM）¹中可見一斑。

對我們葡萄牙人來說，現時也應是我們以“全新眼光”看待中國的時候了。歷史的氣候促使我們在三年多一點的時間內（至1999年12月20日止）逐漸放棄自1557年以來在澳門擔當的管治角色。

因此，為本文²所撰的題目是既合時又合理的。

“最後的共產大國”是本文的關注點。這大國已踏上演變之路，這路既無任何模式可遁，也無準確資料可據。

* 葡萄牙駐北京大使館公使銜參贊

1. 亞歐會議，是隨着（1996年2月29日、3月1日和2日的）曼谷高峰會議所展開的亞歐對話的會晤，並定出下次會議於1998年在倫敦和2000年在南韓舉行。
2. 本文是應里斯本外交部所籌辦的考試而撰的（1996年5月）。

第一點：今天的中國是一個怎樣的國家？

- 她是一個佔地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國家，有十二億人（佔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在世界中，她的經濟增長很快（在最近十四年中平均增長率為7%）；她又位於亞太區，預期這區發展的貿易在本世紀末時將佔全球貿易的一半；
- 她是一個以大量“中國製造”的產品進軍我們市場的國家（這些產品在某程度上與“台灣製造”和“香港製造”的產品相比也不遑多讓）；她表現出一種姿態，就是世界貿易組織倘無她的加入，便會淪為一個“區域”的貿易組織；
- 另外，她又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國家。她是未來的“超級大國”，在軍隊方面，她擁有三百萬正規軍人（加上一百二十萬後備役）；她又擁有核子和太空的力量。然而，官方卻承認，在發展上存在一些差異（例如工業和第三產業發展蓬勃的沿海區，尤以經濟特區為甚，和仍處於原始農業和亟需援助的內陸區）；她又是一個有六千五百萬窮人、一億五千萬文盲的國家；失業人數在城市區的有五千萬，在農村區的有一億五千萬，而流動人口（無固定職業和待業的）據統計約有八千萬；
- 她是一個具有多種古老文化準則的國家，在文化上和意識形態上的準則對很多人影響深遠；她是安全理事會的常任委員，是唯一生氣勃發的共產大國；她對外政策的主要路線是捍衛建立一個較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並謀求全球的和平及發展（有意暗示她所要捍衛的與世界強國美國所捍衛的不同）。

第二點：中國想成為一個怎樣的國家？

正如我們一樣，中國正步向第二個千年。

為了迎接這個年代，中國在經濟上訂立了一個十五年的經濟規劃，其分為一個五年計劃（即第九個五年計劃，由1996至2000年）和一個“至2010年的長期發展計劃”。這兩個計劃均在最近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年會中討論並已獲得通過。

這是一個重要的規劃，因為中國和其領導層要在此時藉此謀求舉足輕重的“經濟成就”

這是多麼重要的計劃，以至中國在某程度上要作出“犧牲”，凍結所有的紛爭和對世界的地緣政治雄心。

倘進行順利，中國肯定會有所轉變（我相信其程度會超乎其領導人所預期的）。由於這是在世界經濟越形緊密的情況下所發生的轉變，其後果最終亦會導致我們世界的轉變（倘失敗了，我們亦將受到牽連）。

因此，重要的是要認識中國在這歷史時刻所採用的戰略。這非單因為這戰略對中國本身的重要性，也因為中國是諸“新興工業國家”的榜樣。

在經濟上，中國要貫徹經濟結構的重整、向外面的世界開放及保持由經濟所支撐的發展。

首要的問題是保持適度的增長。一方面要避免“經濟過熱”（這是要保持高增長率的自然結果），一方面又要維持其不斷的增長，如此方能繼續回應不斷增加的人口（儘管採取控制生育和其他的措施，第九個五年計劃仍預測1996年為正10%）的起碼需求。

因此，1996年的增長率便定為8%（九五年為10.2%）。

對第九個五年計劃的目標和任務進行詳盡分析固然重要（因擬本文³時的時間不容許），更重要的是要查察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是否與該計劃的指向相符。

第三點：中國需在經濟增長模式方面要作怎樣的轉變？

以分析各種結果和以中國一貫的方式分析前期所犯錯誤為起點，當今的領導層從國家需要經濟增長模式作出兩種轉變所得出的結論是：

1. 從“傳統的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
2. 全國各地的發展和收益達到最大程度的均衡。

其次是與中國領導層所具有的一種清晰觀念有關，就是“發達的沿海區和落後的內陸區”有分裂的危險。這會再次在國內增加差異，使同一區域內貧富懸殊，令社會不穩定和人口的內部流動加劇。據官方數字顯示，流動人口的數字為三千萬，也有人估計為八千萬。

所期望的第一種轉變——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是舉足輕重的，因為此舉會動搖本身經濟系統的根基（亦可能引起社會和政治制度的轉變）。

中國領導層驗證所得：四十年的發展和十七年的經濟改革（鄧小平所倡導的）以及向外開放已大大提高經濟增長的水平，但目前的經濟增長模式正顯示過猶和不及的現象：

- 技術落後和品質低劣的產品；
- 資源的高消耗（不可能繼續下去，因為經濟的層次已提高）；
- 收益相應資本為低；
- 虧損嚴重和極度浪費以及經濟效益下降。

因此，當前急務是摒棄以前不合理的模式，並以一“訣竅”捍衛上述的計劃，該訣竅陳述如下：

“在國家宏觀調控指引下容許市場按其基本功能分配資源”。

如此觀之，基本的概念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一經濟之所以屬“市場的”是因為市場是運作的機制（市場是經濟活動的基本調節機制，透過競爭提高效率）。

3. 參閱前注。

一經濟之所以屬“社會主義的”是因為有“宏觀調控”（人們往往只談及宏觀調控而避談“國家”，且國家一詞常以不大為人注意的形式出現）。

第四點：在轉變的形勢下，演變會有什麼前景和怎樣進行對話？

必須要指出，改變經濟模式是中國領導層所期許的厚望，因為這改變可透視中國未來的演變，而該願望是基於實際的需要而引發的（準確地說，中國人是非常講求實際的民族）。

這願望亦同樣由鄧小平要把港澳的資本主義與中國經濟改革二者的優點互相結合的戰略眼光所確認（一國兩制），而廣東省經濟因此而確實得益也說明了鄧氏的眼光能經得起考驗。

此外，也要看看這戰略眼光的最終目標是什麼。當然就是要把“偉大中國”的另一部分台灣收復，其利益效果亦在台灣鄰省福建獲得驗證，而且福建在一個已統一的中國中即將面臨的未來衝擊必較港澳的為大。

那一邊廂，中國的國際夥伴此際已察覺到這種轉變。對我們來說份外重要的是要關注歐盟的觀點：

- 一 按照大會就委員會在長期政策方面與中國溝通的課題（95年11月）所作結論，其認為引入市場經濟的機制將有利於中國加入世貿；
- 一 “亞歐會議”（中國是會員國）提出新亞歐合作經營主要是基於對“市場經濟共同的承諾和……（基於）貿易開放制度”。

如是觀之，除內部重新確定要走的市場路線外，中方亦牽涉有內部和多邊的承諾⁴。

在經濟方面的對話當然會是較易進行的。

第五點：對政治演變又可有什麼期望？

此問題在於當中國的領導人⁵談及“市場”時，他們只是在談經濟而不是在談政治，他們的偉論和“謬論”正如有人這樣寫道⁶這個理論是他們試圖抓緊政治，但要經濟無限期地開放下去。

4. 中國經濟開放之路亦在“APEC”顯示出來，特別是在95年11月的大阪高峰會議上。

“APEC”即“亞太經濟合作（論壇）”，設於1989年，有十八個會員會（汶萊、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澳洲、紐西蘭、巴布亞新畿內亞、中國、日本、南韓、香港、台灣、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和智利）。

5. 這裏所說的“中國領導人”和“中國領導層”是廣義的，不單包括政治領導層而且包括軍事領導人。

6. 本人認為William H. Overholt的“中國，未來的超級大國”所提的理解及意見是特別恰當的，在本文中大量引用了他的文字。

事實上，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模式與亞太的有關模式相去並不甚遠。亞太的模式已令亞洲夥伴的經濟騰飛。這些亞洲夥伴如南韓、台灣、香港、新加坡和泰國，它們雖然小但成就非凡。（在某一程度上，這路向與前蘇聯及其東歐夥伴在柏林圍牆倒塌後所選擇的路向正好相反）。

中國情況的不同之處似乎主要在於國家極度龐大的範圍和在這範圍內推行的模式，其成就只在較小範圍的經濟得到證明。

要注意的是鄧氏為解釋他倡導的改革所持的最大理由肯定是中國的貧窮（大部分都是因1958至1961年間的“大躍進”和1966至1976年間的文化大革命引起的）跟其鄰近的東南亞的欣欣向榮之間的對比。這種對比顯然已令一些較為迫切的國策受到挫折，如收復台灣、與俄羅斯爭一日長短和蓄聚區域勢力（後者在日本經濟的優勢下是難成氣候的）。

從亞太區這些較小的經濟給我們的啟示是，它們的經濟起飛終於在一定期限內為這些國家帶來了社會和政治組織的自由態勢以及戰略和安全的穩定態勢。

關於這點，適宜跟進“民主先決條件”漸次出現的情況，諸如南韓（可見其生氣勃發，那些先決條件因此而在政治復興的過程中獲得肯定）和台灣（可見於最近的選舉——95年11月的國會選舉和96年的總統選舉）。

同樣的事情可會發生在中國？

肯定會，但曠日持久，而且會冒很多大風險，然而我們會——請容許我這樣說——很安樂！

可以作如下的假設：

倘中國的經濟改革真的已能在中國獲得可觀數目的支持者——即鄧氏為他所倡導的改革所選的“漸進”道路似乎已走完——那麼，在鄧後或許便會在中國出現持續的鬥爭，這鬥爭並非針對改革的領導層而只是針對改革的速度和廣度。

或曰，倘這鬥爭並非只針對改革的速度和廣度並且針對改革的領導層時，那麼，結果便南轅北轍了，因為會引起內戰。

第六點：那麼，要與中國建立什麼樣的對話關係？

此刻在中國討論人物是無關重要的。

重要的是我們西方人、歐洲人或美國人可以向我們的中國夥伴和亞洲夥伴提供能引起他們興趣的合作。

不要以為這是大放厥詞！一方面，曼谷的亞歐會議所發佈的聲明中不是高叫要在平等、合作的精神和……分擔憂慮的基礎下在業已加強的對話中“冶煉”出新的全球性亞歐夥伴嗎？

另一方面，這合作是有具體內容的，就是自開放以來與中國進行的歐洲貿易量增加了十四倍，一如歐洲委員會最近預測歐盟始終會獲得中國市場的15%的份額⁷。

雙方所建立的對話關係已有二十一年，這已不是新鮮的事了（自1975年，歐洲共同體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1985年隨着簽訂一項貿易和合作協議才有實質的對話；自1994年6月起，該協議才體現在雙邊的政治對話中。這些對話除了關於一些專門話題例如最近的人權話題之外，又共同參與了其他的協約，例如“東南亞國家聯盟”⁸ 外長會議、“東盟地區論壇”⁹和關於加入世貿組織的預備對話。

至於因歷史的背景成為亞洲太平洋的地理夥伴的美國（當馬歇爾計劃幫助歐洲復甦與穩定時，美國也協助亞洲的發展和軍事的穩定）比歐洲更快知道關於正在亞洲發生的事情的重要性的亞洲參與其現代化程序的重要性。如果不是這樣，亞洲便會淪為全球經濟遊戲。

另一方面，美國洞悉中國在太平洋的勢力和重要性正在醞釀。在戰略和安全的觀點下，多次透過國防部長Perry和助理國務卿Nye宣稱願意以協商的政策而非以抗衡的政策對待中國。結果如何，則仍有待分解。

正如前述，由於對持續的經濟成就的極大關注，中國確實已把其紛爭和對全球的地緣政治雄心“凍結”了。

此際，在維持現狀的基礎下，中國與所有的鄰國都和平共處（最近對台灣所作出的反應不是一種直接的對壘，也不是阻止台灣與大陸間強勁的經濟合作繼續發展下去，而是為了要改變這種“現狀”所擺出的一種“強硬姿態”而已¹⁰）。

-
7. 鄧氏的改革是“漸次的”，意即逐一部門發展，力求吸納市民中不斷獲益的各階層（“蘇後”路向是“即時性的”，要在經濟和社會政治活動的所有部門中同時展開改革）。
 8. “ASEAN”即“東南亞國家聯盟”，在1967年時開始設想為一個資本家俱樂部，以對抗河內共產勢力的擴張，當時的成員國有汶萊、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泰國；然而，隨着亞洲“冷戰”的結束，1995年亦加入了越南（至現時為止有七個會員國）。
 9. “ARF”即“東盟地區論壇（安全）”於1994年在曼谷被構思為在“冷戰”後一個新的亞太安全架構，有十八個會員國（除東盟七國外，尚加入澳洲、加拿大、中國、日本、南韓、老撾、柬埔寨（1995年）、紐西蘭、巴布亞新畿內亞、俄羅斯、美國）和歐洲聯盟（共十九個成員國）。
 10. 最近發生在中國和台灣沿岸的軍事行動似乎出於三項主要的考慮：
 - 一 北京的主要目的是阻止中國的和國際的輿論把台灣透過直選和普選選出總統的事當作是中國本身的事（這選舉對中國本身來說是無價值的，但應將之列入統一程序的邏輯中來看，如此，這選舉便成為台灣在回歸祖國過程中所抱持的新姿態）；
 - 一 其次，北京試圖顯示這是中國一個省份的選舉（不是一個主權國的選舉）和中國有足夠的能力封鎖台島；
 - 一 另一方面，這些軍事行動在證明中國已有“自信”和已到適當時候去肯定自己是強國和“一個新時期”已在這區域中誕生（這解釋在北京經常在東盟國家的代表間聽到，並可理解這些國家對這件事的惶恐和步步為營的態度以及其低調的官方評論，同時又可窺見美國所抱持的決定性姿態，這從其派遣兩艘航空母艦往該區可見一斑）。

中國是聯結東部亞洲（北亞與東亞）、中亞和南亞的紐帶，儘管其勢力日漸壯大和在南中國海尋求“活動空間”（這些趨勢自然會引起憂慮和戒心），其現在正產生新戰略秩序的亞太區的重要性，正好解釋了今日美國人和南韓人邀請中國就朝鮮半島進行“四邊會談”，也解釋了葉利欽的訪華，以及上海被選擇為中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間為加強互相信任而訂定多項措施的邊界協約的簽約地。

正如最近美國特別貿易代表, Charlene Barshefsky 大使在香港說，我們今日正處於具有全新和業已擴大的安全概念的時代（已不是傳統的狹窄概念，而是受一些基本戰略概念影響而業已擴大的概念，如“貿易”和“經濟發展”），其提供“機遇創造新的國際關係，該體系非建基於‘互相害怕’（對“冷戰”的害怕）而是建基於‘互相繁榮’（如此，國際貿易便必然成為重心）”

把中國待之以夥伴而非待之以敵人或令人惶恐不安的非我族類實體的優勢便在於此。

以香港為例，“一個充滿不切實際的想法和英式態度的時期，充滿焦慮、不明朗因素、金融滑落和因文化衝擊所引致的家庭苦惱的時期”。這個例子符合以上的觀點，並“引出一個可能出現的意念，當擊敗蘇聯的西方與正戰勝貧窮的中國對壘時，這個意念便會出現”¹¹。

中國以主宰世界大部分地區的命運的姿態出現，創造了歷史中的大機遇——這亦是她所面對的眾多巨大危機之一。

無論如何，較為迎合這個形勢的似乎是“戰略的合一”。這是我們在葡方與中方處理關於澳門事務中所找到的例子，也為中國人所認同，亦因此而令葡方愜意非常，並為葡方在雙邊關係上建立聲譽。

香港和澳門過渡末期的程序令中國的重要性越益凸顯，由於港澳在歐亞的對話中亦具有代表性，因此具有極大的意義。

這是“唯一的機會把港澳變成全球的中心，它能把中國（和華僑資本家）、歐洲（在港澳具有必然的歷史地位）和美國（其在香港有舉足輕重的重要性）的戰略利益滙聚在一起”¹²。

此舉只是把實質的內容充實歐盟執行主席在慶祝聯合國五十周年儀式上所提出的聲明，其時與會者正提出包括了“和平及發展議事日程”的“世界議事日程”——此舉試圖對今日世界的新挑戰給予全球性的回應——當時，執行主席斷言該“世界議事日程”只有透過民族間不計私利的合作方能有成”。

這是本人的願望，亦應是歐洲和世界與中國間建立關係的主導精神，是唯一值得爭取的真正利益。

在創造和肯定“和平與合作的文化”以為“民族合一”的路途上，這將是前進的決定性步伐。

11. William H. Overholt（前述著作）特別貼切的觀點，本人深為理解。

12. 1996年1月20日“Expresso”中 Jorge Nascimento Rodrigues 的評論。

